

论“武化教育”对学校体育的补给作用

晏 骏, 仲亚伟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 广州 510303)

摘要:对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的实然之境与应然之境进行研判,通过文献资料与逻辑分析对“武化教育”内涵进行深度挖掘,认为:“武化教育”是个体从“术”至“道”过程中的“修炼”方式,它是摆脱野蛮而对人的一种“修饰”,注重培养对象的“灵与肉”和谐统一,其不在于知识灌输,而在于通过“武”的手段达到对人生意义之“觉”“悟”的亲切指点。“武化教育”对当今的学校体育具有重要的补给作用:对学生的补给体现在对“德”的培固从“有”到“全”,对“智”的涵养从“一”到“多”,对“体”的养护从“量”到“质”,对“美”的转向从“外拓”到“内聚”;对教师的补给体现促进教育理念从“行为主义”向“建构主义”演进,教育模式从“传统”向“现代”迈进,教师培养由“粗放”向“集约”转向;对体育课程补给体现在对运动认知的自明、健康行为的自省、体育品德的自觉。

关键词:武化教育;学校体育;补给;学生;教师;体育课程

中图分类号: G8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596 (2020) 02-0090-07

党的十九大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武术作为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政治、教育、哲学等联系紧密,并在社会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炼“武化”内涵,充分挖掘新时代“武化”的教育价值并将其用于观照当下学校教育的实然境况,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的传承传播提供创新性举措并形成内在理路,应该成为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其中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武化教育”作为新时代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的“补给养料”,

为发挥学校体育的“运动教化”功能,回归学校体育“追求乐趣的运动文化”初心提供新的指导思路。

1 学校体育实然之境与应然之境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体育价值演进经历了从“社会本位”到“学科本位”再到“个人本位”的变迁。学校体育发展至今,其总体属性为人文学科属性^[1],但从体育课程的内容设置与学生参与后的效果来看,我们对体育学科人文属性的挖掘远不及对运动属性的追求,教师的教授方式仍以“精讲多练”为主流,学生的学习效果仍以“运动密度”为评价指标,而对学生的思想淬炼、品格提升、态度促进等鲜有体现。德国著名学者

收稿日期: 2019-09-01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GD16XTY19);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18jxgg23);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院管青年项目(WSH2019C005)

作者简介: 晏 骏(1990—),男,江西临川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武术教育与文化。

文本信息: 晏骏,仲亚伟.论“武化教育”对学校体育的补给作用[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0,34(2):90-96.

冯·劳厄说过:“教育给予人们的无非是当一切已学过的东西都忘记后所剩下的东西。”我们呼唤体育学科人文属性的回归,并不是要否定体育对增进学生体质的价值,而是强调学校在培养完善的人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过程式教育。因为任何结果式教育追求的都是一个个明确的价值点,而过程教育追求的却是一张价值面^[2]。在过程教育中,培育学生有思想、会思考,让理性与情感同在,身体与心灵相遇,才能促进其全面发展。

21世纪伊始,我国启动了第8次基础教育改革,学校体育发展也逐渐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道路,即由国家层面制定学校体育政策及要求,自上而下进行改革推广普及之路。如针对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体育锻炼被轻视、校内体育锻炼时间被挤占,导致我国青少年体质状况全面下降的问题^[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均反复提及“每天在校锻炼1小时”的要求。但从以上文件颁发时间相隔不到10年,并不断使用“确保”等严格字眼中也可窥见其落实之难、成效之微。我国的学校体育课程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其间我们从未停止过改革,在解决既有问题的过程中不断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促成学校体育螺旋式发展,逐渐趋向理性与成熟,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回归“武化”的人文本真。

2 从“人化”到“武化”的层级演绎

2.1 操作层:填补“人化教育”中实践内容的缺失

近代中国的危难与屈辱,让有识之士认识到“强国必先强种”等一系列人的工具性创造的重要性,认为唯有实利的知识和技术才有价值^[4]。在某一特定时期,教育在“工具人”的培养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面对当今全球化战略竞争的新格局,中国教育必须实现价值观和目标观的革新,即从铸造受人役使的“工具人”向具有强大人格支撑力的“主体人”或“创造人”转变^[5]。反观我国的学校体育课程,自1949年开始共经

历了8次改革,虽然一直倡导“健康第一”“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等人化教育理念,但对教学内容和过程的审视不难发现,其对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观照略显空洞。质言之,学校体育的人化教育依旧存在一定的“名不副实”,行为操作层亟待改善,而主动嵌入更具操作性的“武化”内容,如通过武术谚语和理法提升武术教育的文化性,通过打练结合提高武术教育的趣味性,通过创设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境增进学生对武术技术的理解和掌握等方式,用于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则成为一条可行之路。

2.2 观念层:依靠东方文化树立“以体育人”的教学思维

从洋务派开办西式学堂,把体操规定为必修内容之后,我国的学校体育就烙上了“西化”的印记,之后的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大部分来源于西方体育项目。凸显西方“锦标主义”的价值及追求“高难美新”的特性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校体育教学内容的主流要求。加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一度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严重失衡,那种以迎合世俗、谋取利润为目标的“学店式”商业文化严重冲击了正统教育,甚至毫不留情地撕破了教育的高尚、文明和尊严^[5],学校体育的人文教育收效甚微。众所周知,教育质量不仅包括教育的结果,而且包括教育服务的全过程,强调教育质量内容的全面性^[6]。西方的人化教育思维强调“始基”“元素”“本质”的实体思维,这种思维把课堂教学中的主客体对立起来,忽视课堂教学动态生成性,阻碍遮蔽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发展性。而东方强调“关系”“生成”“实践”的关系思维和实践思维,追求的是教学准备、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三者的动态统一,兼顾目标、过程、结果,强调教学评价的整体性、情境性、动态生成性和发展性。武术作为东方特殊的身体文化,将其融入学校体育教育环节,向“武化教育”转向是对学校体育教学思维的革新。崇尚西方人化教育思维的学校体育有必要去审思那些脱离实际的“高大上”的育人过程,以及其对传统文化因子淡化剔除的倾向,而应该依靠东方思维实施教育,将“关系”“生成”“实践”三个层级的锻炼,作为

当下高效益育人的抓手。

2.3 价值层：视“武化教育”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仅以体育运动这个比较笼统的手段和方法来塑造文明而野性的身体显然是不足用的，因为不同的运动项目其锻炼功能与价值指向有较大的差异。武术积极汲取传统哲学、中医理论和儒家思想中的优秀成果，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态与尚武崇德、艺以显德的武学价值观。从马良创编的“新武术”、徐一冰倡导的学校武术、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国术馆所教习的武术中可以看出，武术不仅承担着“种族不坠”的使命，更一直与学校教育紧密联系，成为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校园武术文化生态发展却呈现失衡态势，武术思想内核的彰显与发挥举步维艰。学界对“武化教育”的界定并未统一，张峰等人^[7]认为“武化教育”是一种体悟教育；陈国荣等人^[8]认为“武化教育”的实质就是倡导武术精神。笔者认为，不论是哪种形式的“武化教育”，均要回归对“全面的人”的培养这一目标，即武术不仅是身体素质的锻炼手段，更应该成为培养人的方式。为此“武化教育”应涵盖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其教育过程并非以武术专业技术为中心，而是以学习武术专业技能的人为中心，武术专业技能仅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或程序，要时刻围绕培养完善的人这一核心来设计。教师应挖掘整理武术内容中具有传统文化特点的育人要素并渗透到教学过程当中；而学生通过对武术动作的体悟，深刻理解武术动作中蕴含的修己成仁的目标追求。当下我们不停追求科学化、现代化目标，却往往丢掉了传统，换来的不是科学精神的发扬，而是科学工具性的泛滥^[9]，因此“武化教育”的回归是时代所需。质言之，“武化教育”更注重培养对象的“灵与肉”和谐统一，即武技传承、强身健体与意志品质、自我修行的统一。可见，对“武化教育”价值内容的再研究，符合新时代“以人为本、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要求。

3 学校体育中“武化教育”补给的实质意蕴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础教育课程承载着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规定了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在立德树人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10]。学校体育作为基础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的“化人”功能。但目前我国学校体育的教学内容，往往过于凸显技术，就连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武术在学校的发展也不过从“淡化套路、突出运用”转向“优化套路、强调应用”而已，其“化人”功能无从体现。教育工作者亟需树立一种思想理念，用于指导当下学校体育改革。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方针，而中华武术是构筑中国精神的必要渠道。中华武术与其他搏击术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其所蕴含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即“文化优势”^[11]。武术文化包括格斗技术所承载的武德修养、礼仪规范、传承方式、尚武精神，以及其体现出的民族心理与民族情感等内容，共同组成了一个全面反映中国文化的完整体系^[12]。“武化教育”注重于个体从“术”至“道”过程的“修炼”，它是摆脱野蛮而对人的一种“修饰”，较之于文化，武化之“化”不在于循循善诱和知识灌输，而在于通过“武”的手段达到对人生意义之“觉”“悟”的亲切指点^[13]。它能使受教育者练就强健体魄，培养坚毅顽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将每一个参与个体铸就成生存“强者”、生活“能人”和生命“英雄”。

4 “武化教育”对学校体育的补给作用

好的教育思想催生好的教育行动方式，好的教育行动方式培养优秀的思想者。虽然学校体育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团队精神、意志品质和审美趣味的功能早已为人所认可，但落实到体育课程实践中学生的获得感、教师成就感都大打折扣，这与当下体育课程内容的文化属性弱化有着密切联系，想必没有哪一个运动项目能像武术一样拥有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因此完全可以利用“武

化教育”对学校体育的学生(主体)、教师(客体)、课程(介体)三个方面进行补益。

4.1 主体的补给: 是学生“德智体美”发展的填充剂

4.1.1 对“德”的培固从“有”到“全”

“德”代表着人的内在品质、品格或品德, 基于“武化育人”的德育是以武术为内容展开的对身体、道德、意志等多方面的综合修为。青少年处在人格发展的动荡期和生理成熟与心理幼稚并存的矛盾期, 他们精力旺盛、易冲动、情绪波动大^[14], 一些学校依旧基于“锦标主义”开展体育运动, 不仅阻塞了学生精力的宣泄渠道, 而且剥夺了广大学生运动参与、获取“运动教化”的权利。武术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加强道德修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武化教育”在民族文化中萃取“化”的力量, 通过道德修养与行为规范对身体进行规训。基于“武化”思想, 我们可以利用武林掌故开展感恩教育, 以爱培德; 用武者“重然诺”气节开展诚信教育, 以诚立德; 用习武的“谦恭虚己”要求开展礼仪教育, 以礼修德; 用武术对抗中武技体验开展自强教育, 以技践德。

4.1.2 对“智”的涵养从“一”到“多”

有关研究表明, 体育锻炼对学生的智力发展有促进作用^[15], 不同的运动项目对智力的培养也各有侧重。武术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发展过程中与军事、教育、哲学等产生了紧密联系, 如《孙子兵法》中饱含着克敌制胜的战略智慧, 《诗经·秦风》中展现出“尚气概, 先勇力, 忘生死”的英勇气概, 《太极拳论》构建了“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这些都是古人对“超验”存在的智慧总结, 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自信成熟。全球化背景下学校体育的发展, 更应立足传统, 创新转化, 挖掘“武化教育”中先民留给我们的智慧, 结合当下,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指导学校体育对“智育”的涵养, 如同陶行知在《文武同化歌》中所写的: “文人武化, 武人文化, 不文不武的文武化。文人不再相骂, 武人不再打架! 联合起来, 创造新天下。”^[16]全方位提升学生“智”的水平, 让“武”融于“智”, 让“智”彰显“武”。

4.1.3 对“体”的养护从“量”到“质”

身体是精神的物质载体。蔡元培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指出: “凡道德以修己为本, 而修己之道, 又以体育为本。”体质健康是每个人幸福和成功的基础, 是国运昌盛、民族奋进、国脉传承的基础^[17]。为此, “体质论”下的学校体育发展成为众多运动项目争相比拟“运动功效”的舞台, 但这又使我们忽略了“体质健康”的实质——不仅是行为技术层的积累, 更是心理价值层的提升。基于“武化教育”的学校体育课程可抽取“武”或相关元素为教学内容, 通过教师的挖掘与学生的运动体验, 在提高学生身体机能的同时, 使他们在运动过程中增进“文化自觉”, 进而坚定“文化自信”, 让个体从体力、胆力、心力逐级进阶促成“三力合一”, 实现体质健康的真正内涵。

4.1.4 对“美”的转向从“外拓”到“内聚”

武术具有鲜明的艺术性, 最终使其发展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我们从技术层面审视学校体育, 身体形态、身体素质成为运动选材的内容, 由此衍生出了当下学校体育“开、绷、直、立”的运动姿态审美标准, 如篮球、足球、排球运动员的基本动作姿态都表现出人体努力向外部空间伸展的倾向。而武术的动作姿态, 常表现为人体四肢沿圆形、8字形与环形等轨迹的空间运动, 将人体爆发出的力量感知聚在一个圆形空间之中。质言之, 基于“武化教育”的学校体育运动审美应转向为以“拧、倾、曲、圆”为特征的内聚形态。从外拓到内聚的转向, 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的回归, 也是对当代思想文化建设与价值体系的重新省思。

4.2 客体的补给: 促进教师教育观的生态建设

4.2.1 教育理念从“行为主义”向“建构主义”演进

学校体育课程的具体实施者是教师, 课程教学的高效性与学生学习的获得感都根源于教师教育的理念。我国虽然进行了多轮的体育教学改革, 但学校体育教师“行为主义”的教育理念依然根深蒂固, 体育教师对运动项目知识和技能的垄断式占有, 使得体育教师对这种“行为主义”过度运用,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不仅毫无个性, 甚

至由敬畏产生恐惧^[18]。行为主义的体育教学过程鲜明地表现出“教师中心”的价值取向,必然忽视学生个体的自然成长与自由发挥,学生由此体现出被动性、胁迫性。从传统的拜师仪式到现今的多元化发展,武术教育过程始终凸显着师徒的缄默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对受教者意能力的培养。这一教育特点包含着师徒的双向互动——师父领进门(师父对传授动作的解构)和修行在个人(徒弟对所学动作的延展),而且将习武者对所学内容的自我建构视为“由术至道”提升的必由之路。为此“武化教育”理念强调在教师引领下,通过创设有关情境,让学生把相关技术知识进行延展,相关规则要求整合为日常行为规范,进而提升教师教学效率与学生学习效果。它是基于“学习者中心”的“建构主义”:即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常常是在社会文化互动中完成的。

4.2.2 教育模式从“传统”向“现代”迈进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不好的教师是奉送真理,好的教师是叫人去发现真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比较发现,我们的传统体育教学思维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某些“工具化”教学功能,进而造成学生身体“异化”与驯服^[19],这种“工具化”导向下的学校体育教育思维不断窄化,也让学生越来越难以企及对“真理的发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当前学校教育的实践原点,学校体育教育应该遵循教育自身的内在理路,站在文化遗产的高度培养国家和民族需要的人才。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如有教无类、君子不器、学思结合、学行结合、启发教育等等,恰恰是反对教育功利主义、倡导体人本思想的,这对于现代社会教育的回归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所以,“武化教育”理念下体育教学的“现代化”形塑,除了利用武术作为工具性价值外,还应挖掘体育教育与优秀文化的契合点^[20],对学生的体育教育过程进行“反向设计”和“正向施工”,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则需要从学生的角度观察事物,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洞悉学生的内心世界,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真正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与社会竞争力。

4.2.3 教师培养由“粗放”向“集约”转向

经过近60年的发展,体育教育专业课程建设和内容设置日趋成熟,但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和育人能力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自身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准也还有提升空间,而且体育教师队伍缺口巨大、技能老化、职业倦怠明显、对地位待遇的反弹性高等众多问题错综复杂^[21],严重阻碍体育教学改革的深化。就当下而言,职前教育培养的体育教师成为“半成品”,而职后教育虽对“半成品”进行“回炉再造”的效用也不明显。此种粗放的培养方式必须改革。当下学校武术教育提出“一校一拳,打练并进,术道融合,德艺兼修”的发展思路,决定了“武化教育”思想下的学校体育教师必须向专业化、精准化发展,教师的培养也要进一步提升其职前的适用性和职后的专业性。质言之,“武化教育”是新时代学校教育理念革新的新路径,它对体育教师职前分层培养(专业化)与职后分类管理(精准化)的培养思路是集约化发展的有力抓手。

4.3 介体的补给:为体育课程核心素养完善提供新视角

4.3.1 运动认知的自明:从“观人”到“观己”

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2017年《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规定了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10]。学生的运动能力(表现为体能状况、运动认知与技战术运用、体育展示与比赛)是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影响因素。不可否认,部分学生在参与学校体育运动过程中体验不到快乐感、获得感,这虽然与遗传、家庭影响等因素有关,但根源在于当下学校体育对“竞赛”文化的宣扬。武术不仅是一个攻防实战的身体运动,更是一个精神修行的过程,是一门“知行合一”的学问^[8],习练中高度重视武德武礼的规范要求,实现“以德统武”的教化目标。基于此,“武化教育”的实质是在“两两相较”的形式和运动过程中对学生个体的关注,考察个体在学校体育活动中的进步,这样完成了学生从“观人”向“观己”的认知转变,因而实现了“自明”,进而达到了“强志”。

4.3.2 健康行为的自省:从“健体”到“健心”

学校体育开展对学生健康行为的养成理应起到关键作用,但在体育教学实践中,对“健康”的理解出现了认识偏差和异化,即:学生不生病或少生病即为健康,这影响了学生参与运动的效果。“武化教育”思想中所包含的习武锻炼意识与习惯、练武健康知识掌握与技法运用、自我情绪调控及环境适应突显了教化过程中对“身心合一”的哲学寻思,质言之,个体应从运动外化“健体”的彰显进阶到运动内心“健心”的涵养,从而提升学生在健康行为中的自省能力。

4.3.3 体育品德的自觉:从“外化”到“内化”

学校体育大多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德行”的培养,如团结奋进、自强不息、永不放弃等。如果我们仅把“德行”作为在学校体育运动语境之下对身体进行规训的话,显然过于片面。如同 Darling 等人认为教养行为不仅包括专门目标的定向行为,也包括非目标定向教养行为^[22]。武术的习练过程,既有身体的规训,但最终是要由此熏陶出武者“刚正不阿、正气凛然”的独特气质和“自我规训、勇敢仗义、自强不息”的情感态度。“武化教育”引导下的体育品德内容也应该注重非目标定向的教养,不断增加广度与深度,全面涵盖体育精神、体育道德、体育品格,并且能将“武化”给予的自尊自信、果敢坚毅、诚信自律、社会责任感、正确的胜负观加以内化,自觉践行日常生活行为规范。质言之,它对体育品德的补给一定是基于生活、回归生活、指导生活。

5 结语

以“武化教育”思想指导学校体育发展,并不是要否定现在学校体育已有的成效,而是要凸显当下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对主体、客体、介体三者的观照,对其进行调试与完善,并由此进一步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更好地发挥武术多功能价值作用,最终达成“形式潜移默化,效果顺其自然,目标水到渠成”的理想局面,真正实现“野蛮其体魄,文明

其精神”。

参考文献:

- [1] 周长江.论体育学科属性与分类[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3(6):113.
- [2] 马剑,邱丕相.武术教育观需要一次境界跨越:从技能教育转向文化教育[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1):46.
- [3] 梁风波,毛振明,程天佑,等.《“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与学校体育改革施策(3)目标:确保学生校内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7):82.
- [4]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1):60-61.
- [5] 潘涌.反思与重构:人化教育及其时代使命[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9):7.
- [6] UNICEF. Defining quality of education [R]. Programme Division, New York. A paper presented by UNICEF at a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education, florence, Italy, 2000.
- [7] 张峰,石萌,张德良,等.学校武化教育的目标定位[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4):94.
- [8] 陈国荣,吕韶钧.武化教育的实质及其当代价值[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120.
- [9] 李彦荣.冲突与融合:中国中小学课程改革文化路向[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 [10] 季浏,钟秉枢.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 [11] 蔡峰,张建华,张健.武术礼文化的内涵探讨及其价值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8(2):138.
- [12] 朴一哲,杜舒书.基于孔子学院模式的武术文化国际传统研究:以韩国为例[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29(1):125.
- [13] 方国清.中国文化与武化论辩[J].体育学刊,2007(1):76.
- [14] 张峰.中小学武术教学改革探骊:以教学目标、内容、实施策略为基点[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5.
- [15] 周志俊.陶行知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4(4):58.
- [16] 梁启超.新民说白话译写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177-179.
- [17] 王登峰.以学校武术教育助力国运昌盛与国脉传承[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7,41(2):71.

- [18] 谢冬兴.高校体育的身体危机与课堂危机[J].体育学刊,2016(6):82.
- [19] 张聪.身体危机下的教育启蒙:试论杨昌济的身体观与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的生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26.
- [20] 王晓晨,赵光圣,陈朋.文化传统视域下武术教育仪式的生成、流变与重构[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7,31(1):78
- [21] 毛振明,丁天翠,邱丽玲,等.论新时代中国学校体育发展问题与协同创新教改方略(1):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的10项“内涵性教改工程”[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8(5):13.
- [22] DARLING N, STEINBERG L. Parentingstyleas-context: anintergrative mode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3,113(3):487.

On the Supply of “Martial Education” to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YAN Jun, ZHONG Yawe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51030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research and judgement on the situation of “ought to be” and “to be”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militar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Martial arts education” is a way for individuals to “cultivate” in the process from “art” to “Tao”. It is a kind of “modification” for people to get rid of barbarism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spirit and flesh” of the training object. It does not lie in the indoctrination of knowledge, but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ns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life through “martial arts”. “Marti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pply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oday. The supply for students is reflect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from “having” to “all”,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igence” from “one” to “many”, the maintenance of “body”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auty” from “extension” to “cohesion”. The supply for teachers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 concept from “behaviorism” to “constructivism”, education mode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and teacher training from “extensive” to “intensive”. The supply for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reflected in self-awareness of sports cognition, self-examination of healthy behavior and self-consciousness of sports morality.

Key words: martial education; school sports; supply; students; teacher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